

近世中國的宗教改革運動

中央研究院
宋光宇博士

先讓我們看一看西班牙人、葡萄牙人東來所帶來的影響。

西元一四九二年，哥倫布發現新大陸。展開了歷史上著名的「地理大發現」。到了一五〇五年，葡萄牙人佔領印度的果亞（Goa）地方，開始經營印度和對東方諸國的貿易。一五一六年，葡萄牙人出現在廣東，據澳門。同一時期，西班牙人先佔領中南美洲，作為殖民地，而後橫越太平洋，於西元一五六五年（明嘉靖四十四年），佔領菲律賓。荷蘭人則佔爪哇。

歐洲人東來，主要是為了求取貿易利潤。從一五六五年

起，一直到了一八一五年，爲了加強美洲跟菲律賓之間的聯繫，西班牙政府每年都派遣兩三艘大帆船（Galleon），橫渡太平洋，往來於墨西哥西岸的阿卡普魯可（Acapulco）和菲律賓的馬尼拉之間。由於這些大帆船的定期往來，美洲與菲律賓之間的貿易自然發展起來。主要交易物是中南美洲盛產的白銀和從中國運來的絲綢與生絲。

自十六世紀開始，美洲銀礦的產量非常豐富。光是秘魯南部波多西（Potosi）銀礦，在一五八一年至一六〇〇年的二十年間，每年平均產銀二

五四〇〇〇公斤。約占當時全世界銀產量的百分之六十多。這麼多的白銀該怎樣運用呢？大部分的白銀運回西班牙本土，去償還他的貿易債務和支付高出其他歐洲國家甚多的生活費用。小部份白銀則讓大帆船帶到東方來，跟中國商人從事絲的貿易。從一五七一年到一八二一年間的兩個半世紀中，總共有價值四億披索（Peso，西班牙貨幣單位）的白銀，自美洲經菲律賓流向中國。一五八六年，一位西班牙官員在給國王腓力二世的信中說：「許多白銀和銀幣都運到那裏（指馬尼拉）去交換中國貨物。這

些銀子雖然有若干仍然留在菲律賓，但其餘全部都為中國大陸運貨到那裡出售的華商所運走」。這樣的報告相當多。

西班牙人到菲律賓後，鑒於和美洲的基地太遠，補給不易，必要從中國取得各種接濟。中國貨的價格，對西班牙人來說，是非常的低廉。西班牙人運之回歐洲，所能獲得的利潤相當高。一六〇七年間，在西班牙的一項會議中，有位官員報告：「銀子之所以自菲律賓大量流出，主要因為中國運到那裡的貨物，售價低廉。同時銀的購買力又很大，故西班牙人都把銀投資於中國貨物，以謀取利潤」。橫渡太平洋的航運費用相當昂貴。只有質輕、量小、價昂的貨品才值得貿易。能符合這個條件的貨品，唯有白銀和絲綢。

一五六七年（明穆宗隆慶元年）明朝政府解除了海禁，正式准許人民自福建漳州府海澄縣出海，前往東洋和西洋從事貿易。所謂東洋，不是指日本，而是菲律賓。當時，在中國每擔值一百兩銀子的湖（州）絲，運到馬尼拉，起碼賺一倍。有時，日本商人也來馬尼拉搶購湖絲，使得絲價劇昇，每斤售銀五兩，每擔值銀五百兩。由於國內和呂宋售價的懸殊，把絲運往菲島出售的中國商人，獲利甚豐。由於湖絲的受歡迎，以太湖流域為中心的長江下游蠶絲產區，成為絲品外銷的主要來源。其次是福建和廣東所產的蠶絲。從明中葉起，太湖流域一直是中國經濟特別繁榮的地方。人口特別多，而且富有，因而有「上有天堂下有蘇杭」的說法。其他的

東南沿海產絲地區也享受很好的經濟發展。連帶的也使得京畿地區（北京和天津一帶）得以繁榮。也就是說，明清時期東半部沿海及沿大運河地區經濟繁榮。

經濟繁榮後，有一大堆關於富裕生活的社會問題產生，如何拉平貧富差距？如何維持公平交易？如何維持店東與伙計的關係？如何維持既得家業於不墜？如何消除因富而來的驕奢淫佚？凡此種種？都是急迫有待解決的問題。

西班牙和葡萄牙人東來，對中國的另一個影響，是農業與人口。

美洲出產的薯類共有兩種，一種是馬鈴薯，又叫洋芋。一種是甘薯，又作番薯（薯）或地瓜。前者於新大陸發現後，傳到愛爾蘭。在愛爾蘭饑

瘠的土地上普遍種植，幫助愛爾蘭人緩和那嚴重的糧食恐慌危機。馬鈴薯雖然也傳入中國，但重要性却遠不及番薯。美洲的番薯最先移植於菲律賓，後來傳入中國。有關番薯傳入中國的說法不一致。茲舉兩種說法如下：

據近人何炳棣先生的研究，大約在十六世紀中葉前後，福建長樂縣商人陳振龍到菲律賓作買賣，回家時，把番薯品種帶回長樂縣種植。到了一五九四年（明神宗萬曆二十二年），福建發生飢荒，陳振龍的兒子陳經綸，把收成的番薯獻給金學曾，並說明栽種番薯的益處。金氏便勸勉人們廣為栽種，以濟飢荒。因此它被稱為「金薯」。約在同一時間，或稍早些，在雲南也有番薯的栽種記錄。可能是經由印度、緬

甸傳過去的。

香港中文大學的金漢昇先生根據清初周亮工（一六二七—一六七二）『閩小紀』的說法，認為番薯先傳入漳州，後及于其他各地。由於番薯可以在非常貧瘠的土地上栽作，原先被人荒棄的不毛之地，都可因番薯的種植而開發利用。

『閩小紀』云：

番薯，萬曆年（一五七三至一六二〇）中得之外國。瘠土砂礫之地，皆可種植。初種於漳郡，漸及於泉州，漸及莆田、近則長樂、福清皆種之。蓋度閩海而南，有呂宋國。……閩人多賈呂宋焉。其國有朱薯，被野連山而是，不待種植。……潤澤可食，或煮，或磨為粉。……夷人雖蔓生不嘗省，然客而不與中國人。中國人截取其

蔓咫尺許，挾小盒中以來。於是入閩十餘年矣。其蔓雖萎，剪插種之。下地數日即榮，故可挾而來。其初入閩時，借閩飢，得是而人足一歲。其種也，不與五穀爭地。凡瘠鹵沙岡，皆可以長。糞治之，則加大，天雨，根益奮滿。即大旱，不治糞，亦不失徑寸圍。泉人鬻之，斤不值一錢，二斤而可飽矣。於是，耄耆童孺、行道鬻乞之人，皆可食之。飢焉得充，多焉而不傷。下至雞犬皆食之。

番薯對中國糧食供應的影響相當大。一個世紀之後，番薯已普遍流傳於中國沿海及華北各省。糧食供應增加，正逢上中國人口快速增加的時候。中國人口在明萬曆年間突破一億，到乾隆五十八年（一七九三

年），估算出人口為四億。兩百年之間，增加了三億人口。這兩百年也正是番薯和另一種來自美洲的農作物玉米，在中國，快速擴散種植的時候。人口增加的因素很多，但糧食供應絕對是個重要的因素。沒有充足的糧食供應，就不可能有

人口爆炸。

明朝末年的人口增加和生

活富裕，引發了種種社會問題。譬如說，飽暖思淫欲是富裕社會的通病，代表這種淫欲弊病的就是有名的『金瓶梅』這本書，以及同時代的『杏花天』『繡榻野史』『隋煬帝艷史』等等。在這種言情小說流行的同時，有許多宗教作品，也就是善書，流傳在世上。像是北宋時李昌齡所撰作的『太上感應篇』，在明清兩代相當盛行。書中的主旨就是「諸惡莫

作、衆善奉行」。它告訴人們，老天賜給人們一定的算計額度。做好事，算計點數就會增加，福祿壽喜也隨之增加。做壞事，則點數扣減，一切惡運就會跟著來，命途乖舛。一旦點數扣光了，人也就死了。書中列舉了許多要被扣分的惡事，要人們注意。

此外，像『玉歷寶鈔』『文昌帝君陰騭文』也都是同一類型的勸善作品。這些作品成書年代較早，所條列的善行惡事和救贖辦法也比較簡單。明萬曆四八年考取進士的袁黃（了凡居士）依仿道教的『太微仙君功過格』，作有名的『功過格』，分十項，詳細條列各種為人處事的善與惡，並且標示出善惡事件的輕重。告訴人們，要努力於修善累功，才能獲得所祈望的功名和幸福。做壞事，就會有惡報。惡報不再

是死亡而已，而是死後要到各殿地獄去接受審判。善惡的記錄是由人身體內的三尸神負責，層層轉報於灶神、土地、城隍，彙到十殿閻王那裡。

『太上感應篇』『玉歷』『功過格』以及地獄罪報冥律觀念等所牽涉的，是中國人的基本生活方式、價值觀念和判別善惡是非的標準。它指導著明清兩代中國人的基本生活方式。面對因富裕而驕奢淫佚的生活，佛教的「禪淨雙修」或敲打唸唱，以及道教的建醮禳祓，就顯得無能為力。不若功過罪報之說來得簡潔有力，而且直接切入人心。功過罪報之說兼援佛道之理，彼此爰引，形成通用的現象。以前的學者都不認為那是宗教。可是，在中國，它明明白白的是中國人宗教的一部份。現在的社會宗教學從生活的角度來論宗教，功過罪報之說就切合主題了。美籍華裔的社會學家楊慶堃稱之為「普化的宗教」(Defused religion)。

(待續)